

第一章 当代安全与战略

克雷格·A·斯奈德

冷战的结束使安全研究发生了形态转换。人们被迫重新思考支撑安全研究的基本假说。从总体上说，国际关系研究，尤其是安全研究的一些关键性概念面临着变更：安全、权力、冲突，以及民族国家。50年来，有关国际冲突的学术性理论描述都是在冷战和两极格局主导下进行的。学者和决策者都一样是在该国际“体系”内解释和预测冲突。但是，他们对冲突本身却未必感兴趣，主要是关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这部分是由于大多数冷战安全理论家都是带着现实主义的范式来观察世界的。现实主义者辩称，国际体系在本质上是无政府状态，各国的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权力或安全。这样，最强大国家的行为也就成了研究国际体系的学生最关注的对象。

现实主义者辩称，以国家为中心的两极冷战是维系国际稳定的最佳保障，而冷战后的多极体系将导致秩序混乱。约翰·摩尔希默（John Mearsheimer）是最早对冷战后安全环境的潜在不稳定性提出警告的人之一。他争辩说，冷战的秩序是通过世界分为两极，以及两极之间军事力量的大致平衡得以保持的。而蔓延的核扩散，不羁的民族主义，以及其他不稳定力量，这些在两个超级大国支配下迄今为止一直被抑制的因素将会被解

放出来，从而导致冷战后世界的动乱和无政府状态，而不是造就一个更有序、更可预见的世界。

另一些人，如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看法却稍有不同。布氏预言说，国际体系将处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世界观和更加相互依存的倾向两者之间。他断言，国际安全将在两个状态之间演变。一端是国际局势的无序加剧：欧洲分裂、前苏联各共和国陷入战乱，而亚太地区则由于地区霸权竞争者的崛起而失去稳定；另一端则是，在美国有选择的战略承诺支持下，欧亚国家扩大安全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国际秩序。

前者的效应已经在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得到体现。在那里，由于苏联霸权的崩溃，导致冷战对国家行为的约束被种族对立所取代。而在合作的一面，欧洲和亚太的地区性国家都把地区性组织，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地区性论坛，看作规范其国家间相互安全行为的最有效的途径。

随着冷战两极格局的消失，需要提出新的安全观念，以适应冷战后世界的军事现实，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在军事方面，核战略与威慑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未来战争的性质等问题将依旧成为主要的关注焦点。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关于战略的理论基础，国际安全（包括地区安全），以及冲突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根源等问题。

什么是战略研究和安全研究？

在战略或安全研究领域，大多数文献要么是聚焦于以传统办法对付传统问题，如约翰·摩尔希默或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等人的著作；要么是以新的办法对付新的问题，如辛西亚·恩

洛伊(Cynthia Enloe)对全球力量关系的女权主义调查；另一些人的研究，如马克·莱维(Marc Levy)论环境安全的著作，布莱德·罗伯茨(Brad Roberts)论人权的著作，以及麦龙·温纳尔(Myron Weiner)关于移民问题的研究，则是以传统的手段来处理新问题。这些著作力图拓宽传统现实主义有关安全的概念，将一些非军事的安全威胁因素，如环境、人权以及跨界流动人群等问题也包括进来。此外还有一个途径，即本书所采用的，以新的办法，重新开展对威慑、扩散以及军事革命等传统问题的争论。因此，本书超越了主导安全领域研究的现实主义分析，以保持这些新方法的内在的连续性。它还通过审视从社会或个人层面到地区或全球层面等不同层次的安全问题，对深化安全研究的进程作了探索。

作者们是在这样一种认识之下联合起来的：现实主义只盯着国家所面临的来自境外的军事威胁，已经不足以判定什么或谁是否安全，这些是什么样的威胁，以及它们源于何处这样一些问题了。

然而，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究竟从哪里将安全研究并入更宽泛的国际关系研究的概念结构体系。看起来，将安全研究看作国际关系的一个子领域，就像国际法一样，是符合逻辑的。但是这样做的问题在于，安全研究的许多重要的问题，难以同国际体系的政治、经济或社会问题中分离出来。如果不了解各方对立的根源，不考虑诸如实力、态势、意识形态和财富等问题，就干脆无法弄清楚战争的军事含义。政治依旧是战争的主要根源。正如莫汉·马利克(Mohan Malik)在第二章中所展示的，早期的战略家们，尤其是克劳塞维茨，都把战争看作是政治的暴力形式。而在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看来，“如何将力量变成一种合理的政策工具，而非无头脑的屠夫

……即如何将政策和战争统一起来”，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对各个不同的子领域进行区分，虽然在很多情况下带有人为性，难以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精确判定，但就提供一个安全问题的分析框架来说，这却很重要。安全研究的广阔范围提供了学术合法性，而战略研究则在军事核心问题上提供了理性的一贯性。理查德·贝茨争辩说：

战略研究的一个危险是：只看见军事的树木，却看不见政治的森林。在冷战时期，这一危险比今天要大。与之相对应的另一个危险则是：由于广泛地确定安全研究的领域，结果把军事研究排挤掉了。这一危险今天正在增大。对于下述问题，目前并无共识：关注军事问题是否依旧是社会科学的重要责任，甚至说，有关军事的知识，对安全研究来说，就好像有关经济体系的知识对政治经济学研究那样至关重要。^①

战略与安全研究：其名下都有什么？

战略研究一词，一直与美国的冷战军事研究方法紧密关联。它也被称作国家安全研究，因为实际情况大体上可以说是：美国人研究美国的安全。战略研究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一直集中关注军事战略。^② 在这一方面，传统的战略研究一直是

^① R·贝茨，《战略研究会生存下去吗？》，载《世界政治学》第 50 卷第 1 期（1997 年）第 7 页。

美国主要的冷战战略家包括伯纳德·布罗迪、艾尔伯特·沃尔斯泰德、亨利·基辛格、威廉·考夫曼、赫尔曼·康恩和托马斯·谢零。见 J·加内特《战略研究及其假定》载 J·贝利斯、K·布斯、J·加内特和 P·威廉姆斯合编的《当代战略研究：第一卷，理论与概念》（伦敦 1987 年版），第 7 页。

国际体系中各种角色赖以达成其政治目标的军事手段。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角色，因为军事力量主要掌握在它们手中，一些非国家的角色，如恐怖主义者、分裂势力和民族解放运动等等，也被列入讨论范围之内。但所以突出国家的首要地位，还因为下述事实：那些非国家的角色通常要么旨在掌握现有国家的权力，要么旨在创建新的国家。

但究竟什么是战略？根据贝西尔·利德尔－哈特（Basil Liddell－Hart）的说法，战略是“配置和运用军事手段以实现政策目的的艺术”；但在海德雷·巴尔（Hedley Bull）看来，它是“为达到既定政策目标，对军事力量的运用”；科林·格雷（Collin Gray）说，战略是“军事实力和政治目的之间的关系”；而安德列·博弗列（André Beaufré）则主张它是一门“两个对立的意志运用力量解决其争端的辩证艺术”；路易斯·霍尔（Louis Halle）把战略研究定义为“政治科学的分支，内容是有关国家所能获得的战争能力的政治意义”。这样，我们可以说，战略涉及的是在国际关系中对力量的实际或威胁使用。因此，战略研究就是关于力量工具如何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伴随着美国主导的战略研究，一个“英国”或“英语的”学派发展起来了。在安全研究的主题下，它的考察范围更加广泛。作为对战略研究过分集中关注军事的反应，安全研究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开始风光起来。在对有关世界如何运转的基本设想的问题上，战略研究和安全研究并没什么不同，区别在于它们对安全威胁的认识上。

如上所述，战略研究的基础是对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解释。现实主义者主张，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本质，国家应对永久和平的可能性、世界政府和裁军的设想，以及诸如集体安全或合作安全这样的观念持怀疑态度。结果之一便是，战略研

究更多地集中关注国家所面临的军事威胁。而安全研究则拓宽了研究范围，不仅包括军事威胁，还包括非军事威胁；不仅仅包括对国家的威胁，还包括对非国家角色和次国家集团的威胁。

安全研究还包括了一个更激进的派别，即批判性安全学派。它运用批判理论的方法，对国际体系本身的性质，以及构成该体系的权力关系提出了疑问。批判性安全对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说，即国际体系是一个注定或既成的不变实体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与之相对，批判理论家们主张，国际“体系”是社会构成的，也就是说，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一致认为它应当存在。这并不是说，人们作出了自觉的决定，而是说人们的相互作用创造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其本质并非自然或绝对的。也就是说，批判性理论家们不像现实主义者那样，把国际体系看作无政府状态，而是把国际无政府状态看作一种社会构造出来的结构。因此，批判性安全理论关注的中心是改变我们思考安全的方法，改变各角色在体系中的作用，以及各角色对体系的构成。戴维·穆提默 (David Mutimer) 将在第 4 章中详细探讨和运用这一方法。

虽然安全研究采用了一个宽泛的安全定义，其结果是使它更加接近国际关系，而不是战略研究；但它与前者相比的确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它不仅研究战争的起因与结局，（这是许多国际关系学者的主要兴趣所在）它还研究战争的实施。战争的实施是一门重要的学问，因为走人战争的决策和战争的结局经常是取决于军事而不是政治。贝茨争辩说，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同模式（指 40 年代初，德国控制西欧的能力——它在 1914 年至 1918 年期间无法获得的结果）并不能只从实力指标（即人口、军队和经济的规模，可获得的自然资源的

数量等)中得到解释。相反,倒是德国军队成功地发明了闪电战战略(Blitzkrieg strategy),将军事新技术与装甲战理论结合在一起,成为其在二战初期胜利的关键因素。同样,德国在那场战争中的最终战败,也是消耗战和德国领导人战略和政治失算两方面因素相结合的结果。^①安德鲁·拉瑟姆(Andrew Latham)在第10章中就这一类型的问题分析做了更加详细的阐述。

战略研究在冷战期间的发展

在我们充分理解冷战结束对战略研究的影响之前,首先应当弄明白该领域在冷战前和冷战期间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这很重要。探讨广泛的安全问题以及如何防止战争的第一本书是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于1942年出版的《战争研究》(Study of War)。该书与古典战略家的著作不同,它们多将战争看作国家的工具。而昆西·赖特所关注的却不是国家安全问题或国家战略的替代物,他把外交、国际谅解、仲裁、民族自决、裁军,以及集体安全,都视为国际安全与稳定的保障手段。^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关战争的研究继续沿着这一道路前进。战后初期的战略家们对四个关键性主题进行了探讨:第一,安全并非每个国家在每时每刻的头等大事,它只不过是一个重要的随历史环境而变的关切问题。这一领域的理论家们关注着军事安全与诸如经济福利和个人自由等其他价值之间的交换计算问题。其次,对国家安全而言,军事和非军事的政策工

^① R·贝茨,《战略研究会生存下去吗》载《世界政治学》第50卷第1期(1997年第7页)。

^② D·鲍得温,《安全研究与冷战的结束》,载《世界政治学》第48卷第1期(1995年)第119—120页。

具手段都很重要。第三，承认安全的困境（即一个国家增强其安全的行为会反过来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导致慎重使用军事力量。第四，在国家安全与国内事务之间，如经济、公民自由和民主程序等等，业已形成关联。^①

虽然这一类型的分析在冷战期间一直存在，但却处于边缘地位。因为战略研究的眼界过于狭隘，忽略了国内威胁和非军事威胁，集中关注核武器问题，以及由于美国丧失核垄断地位而导致全球核大战机会日趋上升的问题。在这一时期，战略研究繁荣起来了，因为核威慑在本质上具有很强的理论色彩，而实践性却不突出。在这一领域提出的重大问题是关于军备控制和有限战争的，其结果之一便是，通过威慑概念和美苏战略均势，冷战的安全日程被概念化了。这两个集团之间基于意识形态的复杂对立被简单化了，变成了控制联盟以及核稳定等问题。大家都认为，决定国家行为的，是实力地位政策，或者说，是通过以威胁操控和力量投送影响对手行为方式的战略来追求最大国家安全的政策。^②

这是思想上的一个重要转变。虽然此前也有学者集中关注安全的定义问题，安全与其他目的相比的重要性，以及应如何获得安全，但新的关注焦点却是如何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用作政策工具，却又不冒核交战的风险。然而这一类型的思想过分关注军事工具，导致了过分强调国家安全的军事方面，而对历史、文化和政治等非军事方面关注太少。

由于集中关注核威慑及有限核战争等抽象理论问题，造成

① D·鲍得温，《安全研究与冷战的结束》，载《世界政治学》第48卷第1期（1995年）第119—120页。

② E·A·卡罗杰日，《安全研究在冷战后向何处去》载K·P·巴及派和S·P·科恩主编的《冷战后的南亚：国际展望》（Boulder, CO, 1993年版）第16页。

从 6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许多从事战略研究的人发现自己无法应付当代的战略问题，如越南战争及其他殖民时代后的民族解放战争问题。学术性战略分析家过分专于美苏关系等全球战略问题上了，其结果是，他们无法对这些地区性冲突提供真知灼见。的确，他们倾向于根据冷战分野来解释这些冲突，将它们看作“代理人战争”。不仅如此，那些确实对第三世界冲突进行了研究的战略家们则更多是从实践者而不是学术理论家的角度看问题。他们集中精力研究反叛乱行动的案例，并得出结论：美国在越南的经验表明，理论一旦付诸实践便遭遇失败。^①

还有些学者对非核问题进行了考察，但也还是继续关注冷战分野。这些学者开始对北约常规部队在欧洲打一场常规战争的能力提出质疑。他们提出的问题集中在北约部队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编制体制和作战理论等方面。^② 战略研究也发现，由于局限于关注军事问题，它自身受到了其他方面的挑战，如和平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挑战。它们可更好地

见 R·贝茨，《战略研究会生存下去吗》第 13 页，特别是注释第 11 条。有关案例研究的例证还包括 D·派克的《越共》（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66 年版），J·雷斯的《走向龙安战争》（加州伯克利 1972 年版），D·布劳法博的《反叛乱的年代》（纽约 1977 年版），L·凯博的《冲突的神话：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发展与越南战争》（纽约 1983 年版），D·M·沙佛尔的《要命的范式》（普林斯顿，纽约州 1988 年版），T·龙姆佩里的《从人民战争到人民统治》（查佩尔山 1996 年版）。

这些学者包括 R·贝茨，《突然袭击》（华盛顿特区 1982 年版），J·博查尔德，《危机中的指挥》（纽约 1991 年版）；E·康恩，《公民与士兵》（伊撒卡，NY，1985 年版）；J·奇根，《交战的阵面》（纽约 1976 年版）；E·鲁特维克，《战略》（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87 年版）；J·摩尔希默，《常规威慑》（伊撒卡，NY，1983 年版）；B·波森，《军事理论的来源》（伊撒卡，NY，1984 年版）；S·罗森，《打赢一场战争》（伊撒卡，NY，1991 年版）；M·凡·克里佛尔德，《满足战争的需要》（纽约 1977 年版）；M·凡·克里佛尔德，《战争中的指挥》（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85 年版）。

解释诸如缓和、经济相互依存、第三世界的贫困以及环境主义等问题。尤其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禁运促使下述观念的形成：西方的生活水准不仅面临军事威胁，还受到了非军事因素的威胁。由于 80 年代在里根总统任期内冷战再度抬头，战略研究又从这里重新集中到有关军事力量的威胁、使用和控制问题上。换言之，又回到用军事手段对抗军事挑战上来了。如此直至冷战结束。

总之，冷战影响了战略研究进行中所关注的重点，使它偏离较广泛的问题，如安全政策应如何与更大的外交政策目标相匹配等，转向了核武器和核战略的技术和理论、东西方关系，以及美国与西欧安全等问题。核武器则使战略研究的关注重心进一步扭曲，即让战略分析家去琢磨：如何发挥核力量的威胁作用，同时又竭力避免动用核武器。

冷战后的发展与思想的转变

对于冷战结束给安全研究领域带来的影响，安全分析家们的看法是一致的。首先，军事力量的作用受到进一步怀疑。当旧的战略研究学派同意，有关军事力量的问题必须置于国际体系更开阔的政治和经济范围中来看待时，伴随着冷战结束而重新抬头的自由主义的多边合作主张却已剥夺了军事力量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合法性。在某些人看来，这意味着军事威胁的相关性已经下降；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是因为军事工具已经用处不大了。其次，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思考安全问题的方法。在一些人看来，这是冷战后根本性环境变化的结果；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是因为战略研究的失败，未能预见到冷战结束。第三，有必要拓宽安全概念的范围。同样，在一些人看来，这意

意味着定义的延伸，包括国内问题对国家安全议程的影响；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意味着把国家福祉所面临的非军事威胁也看作安全威胁。

重新定义安全

为了使安全研究能够适应冷战后的时代，有必要转变安全思考。需要就三个宽泛的问题提出疑问：作为目标的安全，追求安全的手段，以及安全与国内事务的关系。首先应当考虑的问题是安全是否仍被列为国家首要目标。虽然过去战略分析家坚持安全是第一位的，但今天这一说法是否仍然成立？安全是重要的，但是需要多大的安全？是否存在与安全同等重要的其他基础性国家利益？如果一个国家没有食品、没有耕地或没有饮用水，要安全又有什么用呢？在冷战后的时代，尤其是在西方，很多人对安全的边际成本提出了疑问。大多数人愿意接受这样的看法，即西方国家的安全太过剩了，因此在安全上投入 1 美元，与对其他不那么过剩产品的 1 美元投入相比，所产生的收益要小得多。换句话说，如果军事预算所带来的安全超出了现实需要程度，那么减少军事预算，将那些钱用在诸如清洁环境或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就能获得更好的效费比。

安全研究同样也倾向于根据安全的目标来审查安全手段。也就是说，安全分析家们研究军事力量的使用，但却没有花同样的精力来研究使用这些力量究竟是为了什么。白利·鲍德温（Barry Baldwin）认为，这完全偏离了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在冷战期间，当人们认为就其本质而言，安全威胁主要就是军事威胁时，可以理解，解决的办法也主要靠使用军事力量。但在冷战后时代，人们承认安全威胁也会来自其他领域，如环境和人权，但决不仅这两方面，那么只有通过平衡地运用外交政策的

各种手段才能实现安全。

由于战略研究与现实主义关系紧密，后者将国家视为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角色，战略研究也就难以处理来自国内的不安全因素。在冷战后时代，安全的目的正在从国家向个人和次国家群体转移。这意味着将把个人怎样会威胁到国家（或统治政权），或反过来，国家又会怎样主要以政权维护和国家安全为名，威胁个人的安全作为一个关注重心。

本书的结构

为了充分探讨从战略研究向安全研究转移的意义，弄清这两个思想学派的理论基础很重要。因此，本书从检验战略研究和安全研究的前沿理论阵地入手，首先对古典战略家和现代现实主义理论家进行探讨，尔后探讨我们如何思考安全问题的各种其他选择措施。这将引导我们考察该领域当前的某些争论，包括有关核战略、威慑、扩散、作战样式的现代发展，以及新军事革命等问题的辩论。

第2章考察战略思想的历史发展。它从讨论有关古典战略家的大陆学派开始，包括了诸如尼科洛·马基亚维利、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安东尼·若米尼、贝西尔·利德尔－哈特和孙子等各理论家。接着又讨论了海洋战略的发展，关注的重点是讨论艾尔弗雷德·塞耶尔·马汉的著作。在这一章，莫汉·马利克在马汉与若米尼之间画了两条平行线。然后，作者又转入了对航空派理论家的讨论：朱里奥·杜黑（*Giulio Douhet*）、比利·米切尔（*Billy Mitchell*）、休·特伦查德（*Hugh Trenchard*），还有亚历山大·德·塞维斯基（*Alexander de Seversky*），最后部分则讨论作战样式的革命学派。

第 3 至第 5 章讨论更具当代特点的安全理论。第 3 章介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和战略研究中的主要范式。它首先从现实主义的定义开始，追溯了现实主义思想的发展轨迹，并对关键性批评做出回应。接着，这一章叙述了当前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的争论，如结构现实主义的进攻性和防御性理论变体，以及权力分散或威胁的水平与来源究竟是不是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因素。然后，这一章又探讨了冷战结束以后，现实主义的未来。在这一节，辛·林 - 琼斯 (Sean Lynn - Jones) 审视了现实主义在预测冷战结束问题上的失败，其在冷战后世界的持续适用性，及其对未来国际政治的预测能力。

第 4 和第 5 章都是对安全研究中现实主义方法提出的批评，但切入点不同。戴维·穆提默在第 4 章中引入了安全研究的批判理论。这一章的目的在于探讨由承认现实主义提出的“安全”理解存在局限性而发展起来的思想。穆提默首先论证，传统的安全定义“保护国家免受外来武装攻击”存在着不足，有必要深入到国家的组成要素中去分析：谁的安全？怎样提供这一安全？应当如何研究安全？

第 5 章介绍了“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各种维持安全的替代性选择。这一章主要关注的是地区安全结构，并包括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地区安全方法，例如集体防务、集体安全和协同安全，但它同时也对这些由军事因素主导的方法提出了替代性思路，如共同安全、综合安全与合作安全。

第 6 章至第 8 章探讨的是安全领域中的核问题。第 6 章探讨核威慑理论，并向读者提供了评价核威慑理论所需的工具。凯斯·克劳斯 (Keith Krause) 首先追溯了该理论的起源及其背后的理性原则，然后审查了对合理威慑理论的各种主要批评，以及是哪些问题导致了对威慑的更带根本性的批判，例如其作

为英美理论所表现出的种族优越感。

第 7 章探讨了对未来核战略的样式与作用可能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这一分析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对美国核战略的较为详细的考察，以及对影响其他核武器国家核战略的各种问题的概略勾勒。在这一章，安德鲁·巴特弗伊（Andrew Butfoy）为读者清晰地阐述了冷战对美国核战略的计划的影响，冷战后美国核政策的目标，以及核大国与核中小国家在政策目标上的区别。

第 8 章考察核扩散问题。甬管对与不对，这一问题已被推为冷战后安全日程中的头号问题。这一章从审视核不扩散机制的发展入手，然后对该机制当前存在的问题作了评估。最后探讨的是，为了处理核供应商控制措施方面的某些漏洞，又对这一机制进行了哪些修改。

第 9 和第 10 章考察战争特性的变化。第 9 章首先对当今所发生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不同的冲突类型进行了探索。在这一章，克雷格·A·斯奈德和莫汉·马利克考察了未来 10 年到 20 年中可能爆发的战争的样式。这一章首先对有限战争进行了考察。在这一节，作者探讨了可以限制战争的各种途径，并与全面战争观念进行了对比。接下来一节则对算不上战争或国内战争的各种冲突作了分析，再度考察了各种冲突类型，包括非常规战争或革命战争、“第三等级”冲突、公社冲突，以及维持和平行动与强制和平行动。在最后一节，作者考察了未来冲突的性质，并提出民族国家可能会发现，越来越难以靠威慑来避免这类冲突的爆发，而且一旦威慑失败，要对其做出充分反应也越来越难。

第 10 章观察“信息革命”对军事力量和战争性质的影响。这一章向读者介绍了通常被称为“军事革命”的新战争样式。

在专业或大众文献中的这一主题下，通常还能看到诸如“信息战”、“电脑战”和“第三次浪潮战争”这样的术语。安德鲁·拉瑟姆以探讨工业化全面战争的起源和发展开始这一章，他审视了工业革命对新技术发展的作用，而后者使大规模毁伤最终成为可能。在这一章的第二部分，他探讨了信息革命正对军事产生的影响。虽然标志性的战场转变也许还要几十年才能完成，但这一新作战模式的轮廓已经很清晰可辨，随着“精确摧毁”逻辑取代了“大规模毁伤”逻辑，它也将决定着作战思想、作战手段和作战体制的转型。

第二章 战略思想的演变

J·莫汉·马利克

现代战略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一些经典战略家。考察一下他们的著作，就会发现他们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具有相当好的稳定性。无论技术和战略怎样变化，的确存在着适用任何时代和任何兵种的战略原则。不仅如此，历史背景还可以帮助我们澄清和理解当代的问题。要了解现在和未来，我们需要了解过去，因为事件不是发生在真空中，它们存在着历史根源。如果我们不了解俄罗斯或中国的过去，我们就不能了解它们的今天。历史的确很重要，对于战争原则和军事战略，这一点尤其重要。但历史并不仅仅是未来的指南。今天发生的一切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助于判断未来变化方向的模式。今天人们在任何领域都会听到如此之多的“变化”和“革命”——世界政治、经济的变革、通信技术的革命，当然还有军事革命（RMA）——以致人类生活中随时存在着看不到连续性的危险。我们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也有很多东西没有变。

战争是一个吸引人的主题，对于了解世界及其发展历程至关重要。尽管使用暴力去实现个人的或政治的目的在道德上是令人怀疑的，但在有记载的历史中，战争一直在被人们如此运用。人们研究战争的历史几乎同人们进行战争的历史一样长。

详细的史料记载可追溯到早在公元前 1288 年，埃及人和希泰人（Hittites）之间发生的卡迪什（Kadesh）之战。冯·克劳塞维茨写到，“战争不属于艺术和科学的王国，而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部分。”海军战略家艾尔弗雷德·马汉发出相同的感慨：“冲突是全部生命的基本状态。”

战略在战争或任何军事行动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战略”一词起源于希腊语的“将军”（strategos），通常译作英语的“将军”（general）。从这个意义上说，战略具有明显的军事属性。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民间机构——商行、公司、非军事的政府部门、甚至大学——都开始提出战略一词，战略一词在他们那里通常表示任何类型的政策计划。因此，战略这一术语已不再只限于军事领域。随着战争和社会变得更加复杂，战略的定义得到发展，它包括：

对非军事因素的考虑——经济的、政治的、心理的、道义的、法律的和技术的因素。其更为全面的定义是，战略是动员和指导包括武装力量在内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全部资源，保卫和推进国家利益，使其免受现实或潜在的敌人的侵害。^①

从这一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讲，战略又称为“大战略”。在军事领域，战略指的是涉及实际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政策或计划，将使用武力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② 战略的形成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地理、经济、社会和政治情况。换句话说，战

① D·K·帕利特，《威慑时代的战争》（伦敦 1966 年版）第 32—35 页。

② F·J·威斯特，《古典战略家》（吉隆 1990 年版）第 4 页、第 3—12 页。